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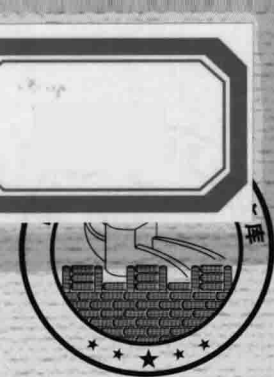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的视点与战略

李 晓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的视点与战略

李 晓 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的视点与战略/李晓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301 - 25575 - 9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国际货币体系—研究 IV. ①F8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0164 号

书 名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的视点与战略

著作责任者 李 晓 等著

责任编辑 兰 慧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5575 - 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em@pup.cn QQ:552063295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33.75 印张 535 千字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 - 62756370



作者简介

李晚 籍贯山东省牟平县，1963年4月生于北京。现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吉林省首批“长白山学者”、吉林省首批高校“学科领军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东亚经济发展。

2004年至今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2005—2009年东亚思想库网络金融工作组中方成员，2009—2012年中韩专家联合研究委员会中方委员/执委、经济组副组长，2009年至今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2013年至今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吉林大学《东北亚论坛》等学术期刊学术编委。

主要研究成果：《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与“人民币亚洲化”》（2009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该书被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购买英文版版权并于2012年1月在海外出版英文版，*Regionalization of the Renminbi*）。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评论》〔日〕、《国际金融》〔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新型霸权国家的金融化与美元体系(代序)

这篇序,权当本课题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中国应采取的立场与战略的基本研究思路和背景的陈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直至今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远远大于其实际行动,更令人悲观的是,除了有关跨国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组织投票权分配等方面的改革提案与行动外,我们没有看到此前人们期许甚多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出现任何重大进展。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学术界针对美国霸权地位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1) 美国霸权地位遭到巨大冲击,标志着美国霸权地位的下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出现重大的乃至根本性的进展,美元霸权将得到明显的约束和控制。

(2) 伴随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将成为制衡美国霸权的重要力量,并形成与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冲突,导致美元霸权崩溃。

(3) 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将有巨大的提升,中国已经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力量。有学者认为,现代国际体系已经进入转型期,即“西方的衰落”和“东方的兴起”的交替时期,世界正在进入“后西方国际体系时代”。

我们认为,以上认识依然基于传统思维,未能看到现阶段美国经济结构的

变化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是不全面甚至错误的。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研究显然存在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仅着重于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专业角度的研究,缺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分析;二是过多地关注当今的现实情况与问题,较少关注历史经验的总结。前一个问题容易导致深入的偏见,后一个问题往往使人目光短浅,缺乏远见。

应该看到,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首先是一个霸权体系及其更替的问题。这个霸权体系及其结构与前一期霸权即大英帝国霸权相比,有两个显著的不同:一是霸权国家的性质(不仅是体量)不同,二是霸权体系的构造与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在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于现阶段主导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制定权的美国及其霸权的认识较以往理性了许多,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对美国霸权的认知依然存在许多误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自身悠久的历史,认定美国不过是个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无视其英国清教徒的移民历程,更无视其欧洲文明的长久积淀,并由此产生盲目的自大心理(尤其是在所谓的软实力认知方面);二是基于中国自身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对美国霸权多报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难以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霸权中性”,此种经验偏执压制理论的后果,导致我们在试图作为抵制美国霸权旗手的同时,却开始被周边国家视为新的地区霸权,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三是基于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及其“贸易国家”特征,难以理解早已成为“金融国家”的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或战略,以“贸易国家”的眼光看待“金融国家”,注定是要付出代价的。^①显然,这三个误区,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极其不利的,甚至会导致相应的战略误判,陷于不必要的战略被动。

一、美国:一个“新型霸权国家”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同以往的霸权国家相比,就霸权的性质而言,美国

^① 关于“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的概念、内涵及其使用,参见本书第一章及其他各章。

是一个“例外的”新型霸权国家^①,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个经过人为的精心设计而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国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不同,美国自1776年获得独立战争胜利后的历史很短,但它的优势则在于承载着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欧洲文明,能够在一块新大陆上进行前所未有的国家建设实践,其《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无处不体现着孟德斯鸠、卢梭、洛克等人的思想成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美国1787年《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开国先哲们基于人类文明的理念,以人性恶为出发点,经过激辩、讨价还价和互相挑剔的四个月,人为地设计出了一套构建国家的宪法体系和政府架构,进而为美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这种人为设计的制度框架,二百多年来运转良好,不仅为美国硬实力的提升,也为其软实力的提升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二,它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资源从而有更大选择性和灵活性的国家。美国权力资源的广泛性既表现为它的军事、经济、技术、领土、人口、自然资源等传统权力资源,也体现在它的教育、文化、理念、制度等新型权力资源。这些权力资源的存在让美国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问题时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和灵活性,使其可以选择单一或多个传统权力资源,或者选择将传统的和新型的权力资源巧妙灵活地结合在一起加以运用。

第三,它是一个“大而富有”的国家,与它相比,以往的霸权国家要么小而富有,要么大而贫穷。在历史上,西班牙、荷兰、英国的本土面积不大,但都曾在海外掠夺和贸易活动中变得十分富有。法国、普鲁士及其后的德意志虽然本土面积较大,但其富裕程度较低,甚至还在与在位霸权国家的连年争霸战争中受到了削弱。沙俄及其继任者苏联则是国土面积庞大,但国民财富不仅总量低而且创造能力较弱,属于典型的大而贫穷的帝国。

第四,它是一个在第一、二、三产业中均拔得头筹的国家,其与非霸权国家间的综合实力差距远超既往霸权国家,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帝国”。美国首先是

^① 有关美国作为“新型霸权国家”的具体研究及其论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见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文中我们从“安全结构的锋利权力、生产、贸易和金融的黏性权力与知识、观念和制度结构的软权力”这样一种三维权力结构的视角,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美国对国际权力的精心设计,尤其是“系统内分权与责任分担”的权力战略的实施。

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大国,这既源于其优越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又得益于其在农业生产上的技术研发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美国在高新技术的制造业领域长期保持国际竞争优势,这一优势更借助其跨国公司组织的全球化生产和国际分工得到增强。此外,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美国不仅拥有众多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更具有在广度上和深度上令他国难以匹敌的国内金融市场,并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场发展的规则制定权。

第五,它是一个兼具强大的商业、海(空)军实力和陆军实力的国家。历史上的西班牙(海军)、荷兰(商业和海军)、法国(陆军)、普鲁士及其后的德意志(陆军)、英帝国(商业和海军)、沙俄(陆军)及其继任者苏联(陆军、海军、空军)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第六,它是一个打破“霸权更替逻辑”,即没有通过与在位霸权国家展开争霸战争而成功获取霸权地位的国家,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霸权更替理论难以解释战争在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导性世界大国过程中的缺失”^①。

第七,它是最接近全球性霸权地位的国家。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时期,英国的霸权范围是区域性的,它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其他老牌殖民强国(如法国)和后起殖民国家(如德国)的竞争和挑战。在美苏争霸的两极体制格局下,“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所覆盖的范围也是区域性的。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霸权的影响力才第一次真正延伸到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全球性大国”。

第八,它是一个有着极佳战略位置的国家。用1902—1925年间法国驻美大使朱尔斯·朱瑟兰(Jules Jusserand)的话说,美国是“一个受到眷顾的国家。美国北部邻国很弱小,南部邻国同样弱小;东部是海洋,西部也是海洋”^②。这赋予了美国两方面的重要优势:一是美国有条件成为在陆权和海权方面的双料强国;二是美国能做到对外战略的收放自如,当预期走向海外能为其带来巨大

^① John Agnew. Trading Blocs or a World That Knows no Boundaries? The British-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 Economy, in C. H. Williams, ed.,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3:133.

^② 相关研究请参见李晓:《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1期;于震、李晓、丁一兵:《东亚经济周期同步性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利益时,它就会坚定不移地推行“扩张主义”,当认定海外活动可能给其造成重大的风险和损失时,它又会毫不迟疑地退回到“孤立主义”。

第九,与以往霸权国家相比,美国通过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了经济的金融化。与此相对应,美国以自身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为基础、以创新性的科技开发能力和市场提供能力为支撑、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美元体系,将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到该体系当中,使其成为“系统内国家(地区)”。

总之,如果我们认定美国作为“新型霸权国家”的上述九个特征属实的话,那么以下三个问题无疑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一是美国作为一个与以往霸权国家不同的“新型霸权国家”,其特有的建国历程、政治经济体制与承蒙上帝之荣光其布道于世界的“单极思维”相结合,不仅使其在重大的国家战略问题上很少犯过错误,而且更具有超强的战略意志、实施能力与策略的自我调整、修复能力,因此,我们能否机械地依照传统的“霸权循环”或更替的“规律”来认知或分析美国霸权的现状与未来?二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大国挑战美国霸权的经验,不论是体系外大国如苏联还是体系内大国如法国、德国(欧洲)还是日本,也不论是单独挑战还是集体行动的挑战,迄今尚无成功的案例,中国作为一个坚持自身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兴大国,应如何明确自身在现阶段及未来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制定出科学、可行的国家战略?三是人类的金融发展史证明,金融业的全面、深入发展需要有严格的制度条件:财产权利明晰、权力的制衡框架严谨、信息公开透明,这三项条件无疑是美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的制度性基础,而且纵观世界,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或地区是无法与美国匹敌的。相应地,中国如果不能在这三项制度性条件的建设上有巨大进步,如何能够真正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怎样能够真正地发展现代金融业,又如何可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者,挑战美国的金融霸权?

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过程与表现

在简要地分析了美国霸权性质的变化以后,还须认真思索霸权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该问题的实质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强大的美元体系?以及,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行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面对以下让人三个难堪的现实:

(1)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四十多年后,美元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美元体系”成为当今世界难以动摇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

(2) 尽管美国国内过度消费,国际收支逆差连年增大,但国际资本净流入依然很大,没有出现根本性的信用危机。

(3) 虽然其他货币在 1971 年以后具有挑战美元霸权的机会,但仅仅是对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未能形成对美元的替代。

事实上,从世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一方面是美国的 GDP 总量相对缩小,另一方面却是美元的主导地位日益强大。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全球的影响过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便开始讨论“美国(元)衰落”的话题,但直至今日,美国(元)依然强大并足以影响世界?

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人们一直在关注“美国(元)衰落”的话题本身,却很少关注或者分析美国(元)霸权是如何维系的,即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

1945 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实体经济作为美国霸权的核心支撑力量,持续相对衰弱。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定的“双挂钩”制度及其难以摆脱的“特里芬难题”,日益成为制约美国霸权的禁锢。表面上看,“特里芬难题”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源,但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拒绝遵守相关的规则——国际收支赤字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为了自身经济发展及内部平衡,拒绝提高利率,拒绝按照黄金官价确保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因此,“黄金魔咒”与固定汇率制度在 60 年代后成为制约美国发展与扩张的巨大障碍。

1971 年 8 月 15 日,“尼克松冲击”使得美国(元)摆脱了这一禁锢。美元从维持金汇兑本位的信用货币(资产货币)转变为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债务货币)。同时,浮动汇率制度成为美国采取不负责任的单边行动的重要前提条件。这是美国用心良苦、策划已久的金融战略行动。其本质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金融逻辑的重大改变——从欠债还钱的“债权人逻辑”转变为欠债不还并继续大肆举债的“债务人逻辑”。

1943—1944 年在筹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过程中著名的“凯恩斯与怀特之争”的核心,即是否应该坚持“债权人逻辑”的问题。时任英国财政大臣顾问的凯恩斯认为,盈余国家应该调整其国际收支的失衡状态。与此相反,美国财政部部

长助理怀特则认为赤字国家应该调整国际收支的失衡状态。他们的观点不仅是对当时两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也是对人类社会金融逻辑的一次挑战。幸运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是按照怀特的论点建立的,它不是强制盈余国家调整,而是以敦促赤字国家调整经济结构、恢复政策约束的宗旨来运行的,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稳定与高速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

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日益恶化,尤其是全面参与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黄金储备日益减少,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价以及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义务(相应地,固定汇率制度导致美元无法贬值)成为束缚美国的桎梏。为此,美国先后采取了四项措施,来摆脱这一“黄金魔咒”:

第一,迫使德国等盈余国家继续持有美元而非购买黄金,瓦解坚持按照黄金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的“法德联盟”。

第二,推进所谓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与改革,建立如“黄金总库”、SDRs等,缓解压力。

第三,美苏缓和,改善中美关系,通过中国让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战争泥潭中脱身,减少军费支出和战争赤字。

第四,美国开始考虑在传统的工业竞争力弱化的同时如何保证经济霸权,更改国际竞争的规则。其重要的标志,就是1971年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一种严重的违约行为——美国人更改了传统的并曾为其坚守的“债权人逻辑”转变为“债务人逻辑”:1977年,当美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转为赤字后,当时的卡特政府便开始宣扬盈余国家有责任对国际收支失衡做出相应的调整。迄今为止,在任何一场金融危机中,国际金融机构为危机国家(地区)所开出的药方几乎都是一致的:勒紧裤带搞紧缩、结构调整,但唯独作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却可以例外,从居民、企业到联邦政府,依然故我地继续大肆举债和消费。

相比较而言,英国(镑)之所以迅速衰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未能成功地改变金融逻辑。美国虽然与英国当年一样,面临本币高估的困境,但通过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可以恣意地印制无约束的美元纸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美国可以放弃其利率调整负担,且能够利用汇率手段控制贸易和资本流动),更改了国际金融规则,且得到了世界的被动认同(制度化),而后美国重新在“债务人逻辑”下建立了一整套维护美元体系的机制。

于是,这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本账户在美国国际收支调整中的地位上升,美元的贬值或升值已经不再是美国(元)地位的标志,而成为美国支配和控制世界的手段。美国可以通过周期性的贬值措施,输出流动性,单边控制世界(债务稀释与违约),掌控资本流动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二是“特里芬难题”中所谓稀缺性与流动性难以同时具备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帝国(罗马、秦汉帝国等)的历史证明,坚持金本位制就必须量入为出,为了外部均衡牺牲内部均衡,一旦脱离了黄金约束,便可以使用法定货币无约束地消费。正是由于美国对金融逻辑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人类依靠生产致富的逻辑,开始依赖消费扩张致富。

正是由于金融逻辑的这种变化,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和“美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两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谓金融化,是指一国的金融部门取代产业部门成为经济活动重心的过程,其本质是国内外政治经济权力的重构。^①

20世纪70年代“滞胀”发生后,金融业开始取代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成为美国霸权的核心支撑力量,尤其是在石油危机和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后,美国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步骤:一是把成本过高的实体经济通过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二是放弃凯恩斯主义,以新自由主义为经济指导思想;三是推行金融全球化、自由化。从此,美国的整体经济结构(社会经济生活)日益金融化。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金融市场、金融从业者、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迅速增强。“超级经理人”阶层崛起及其“自我定价”机制形成。

(2) 金融扩张异常快速,货币发行和债务总量迅速增长。

(3) 摆脱黄金束缚的纸币与信息技术发展相结合,推动了金融创新热潮,衍生金融产品得到大发展(1971年以后衍生金融商品起步,80年代初货币掉期与利率掉期交易出现),金融业的中介活动越来越复杂,经济活动的投机性增强。大多数投资于市场的货币与生产、贸易过程脱离,成为纯粹的投机活动。

(4) 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发生变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日益以股东为核心,经营者的意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其中,金融机构的地位与作用迅速提升。

^① 限于篇幅,这里有关金融化的分析只是文字描述,略去大量的图表与数据资料。

(5) 金融规则做出了有利于经济结构金融化的重大调整。1980年年底以来,美国金融业规则发生了三次重大调整与转变:第一次是1982年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废除;第二次是90年代州际金融业务限制规则的缓解、废除;第三次是1999年废除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其结果,促进了所谓“金融工程”(数学与金融商品开发)的大发展,金融资产证券化的水平与规模极大扩张,并突破国内储蓄资源的制约,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全球的储蓄资源,新的金融盈利模式产生并定型。

(6) 国内外金融权力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所谓金融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现阶段美国的对外金融权力主要有两种。第一,硬权力。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三大评级机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全面控制亚洲地区的相关业务并向全球扩张;另一方面,金融制裁权力增强,并日益成为美国实施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这说明,美国的金融权力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顶点。其后果自然是金融变质,即金融业从为物质生产和雇佣提供必需且廉价的资金供给,转变为提高自身盈利率;这也意味着美国从世界的商业银行家转变成成为投资银行家。

第二,软权力。经济思想的变化与全球推广。这一方面是自由市场原理从学术领域全面进入政治领域(里根—撒切尔革命),经济社会的哲学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从反对逐利和金融投机转变为鼓励人们追求私欲、投机合理,刺激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政策从财政(公共赤字)发展到货币(私人透支、全面举债);另一方面则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实质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力量。

金融化的影响是显著的。一方面,资本(金融权力)近代以来从追逐、依附到开始影响、超越政治权力,并形成全球范围的“超国家权力”,最为典型的就是“华尔街—华盛顿—IMF复合体”的形成;另一方面,金融业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成为现阶段美国霸权的支撑性力量 and 核心利益。这其中,美元体系成为现阶段维系美国霸权的中坚力量。

三、美元体系:运行机制、性质与可持续性

美元体系是美国经济结构金融化过程中金融权力外延的具体表现。它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依据具有广度与深度的国内发达

的金融场所构造的全球性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信用周转体系。具体表现为: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美元是最重要的“锚”货币;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交易货币;美元是最主要的“救市(世)货币”。

现阶段,美元体系拥有四个结构性的自增强机制:

(1) 商品美元的回流机制。表现在三个层面:

① 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增大→采取盯住美元的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各国、各地区所积累的美元储备增多→它们为确保出口竞争力和储备保值不得不增加对美国国债等资产的购买→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持续增大……

② 金融自由化的全球扩展(“华盛顿共识”)→各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缺乏监管与控制能力→货币遭受攻击、金融危机频发→各国预防性增加美元储备→美元回流→美国发行更多的美元……

③ 各国为破解货币困局而不得不以强化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为手段制衡或约束美元→触动美国的核心利益,必将动用政治、军事等一切力量予以离间、打压或遏制(美国重返亚太的本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遭受挫折(如201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及其对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影响)→各国依旧被迫大量累积美元储备→支撑(资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扩张→区域货币合作更加困难……

(2) 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1974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签署了所谓的“不可动摇协议”,虽然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但就其大致的框架而言,显然对美国有四方面的好处:一是确保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依旧可以拥有坚实且难以动摇的储备货币地位(各国为购买石油必须储备美元);二是可以通过印刷本币购买石油资源;三是可以操控石油价格;四是美国境外的石油美元通过还流,不仅可以维持美国资产价格,而且可以为赤字融资。

(3) 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迄今为止的所谓货币金融危机几乎都是货币错配的危机,要么是期限错配,要么是币种错配。但美国却几乎不存在类似的问题,由于美国的外债几乎都是用本币计价的,一方面使得美国在本质上没有外债;另一方面避免了货币错配危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可以避免根本性的货币危机。

(4) 金融危机的美元救助机制。无论是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还是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抑或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元是美国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提供金融救助的关键货币。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

融危机中,美元更是发挥了关键性救市(世)货币的作用,美联储俨然行使着世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基于上诉分析,可以将美元体系的性质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它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在全球的人为扩展,因而,一方面,它是复杂的、自增强的系统,成为当今美国控制世界的结构性权力;另一方面,它也是非合作的、孤立主义的,必定是世界性矛盾、冲突与危机的制造者。黄金的非货币化使得美元及其政策不再被约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与稳定性难以契合的矛盾,使美国采取维护自身利益的单边行动的可行性增强,霸权成本更多地外溢,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霸权国家的传统困境。

第二,美元体系是一个全球性的资本(源)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的含义在于:一方面,系统内国家(贸易国家)无法单独改变规则,而且这种状况短期内难以看到改变的迹象;另一方面,尽管存在于“系统”内的成本高昂,但推翻该系统的成本或损失更大。这种系统崩溃的“恐怖压力”有两种:一是系统崩溃的成本高昂,难以承受;二是该系统将所有系统内国家和地区绑定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美之间所谓的“恐怖的金融均衡”的本质即在于此。所以,对该系统的改革或者调整格外困难。正因为如此,

美国判定,对系统内的其他国家而言,“系统崩溃”的压力(恐怖感)对世界经济造成的伤害远远高于美国(元)霸权的成本,这正是美国可以通过显在尤其是潜在的违约行为打击债权人(变相征税)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凭借商品美元的还流机制、石油交易的美元定价机制、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美国货币当局的“软借贷约束”,美国构建了可以自增强并有效运转的全球资本控制体系,不仅可以确保大量举债而不受他国约束的全球货币秩序,更可以让“系统内国家(地区)”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对外开放并进入系统→获得经济增长的收益→要求更大规模的开放,承担更多的成本→经济发展失衡与不稳定。对美国而言的系统性“自增强机制”,对“系统内国家(地区)”而言则是“自弱化机制”。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控制体系(美元体系)成为一种“新的朝贡体系”(霸权成本的分担机制)。“系统内国家(地区)”不得不自动支撑体系,分担美国(元)的霸权成本。

那么,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元体系可持续吗?

我们的答案是确定的:可持续。

从总体上看,美元体系的自增强机制短期内难以破解。“系统内国家(地区)”一方面缺少改革意愿,另一方面,受到该体系危害最大的国家(地区)往往是那些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的“贸易国家”,改革意愿强烈却无力推进改革。更为重要的是,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重大变化:

第一,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是一种“正和”博弈。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体系一样,都是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但现今的美元体系同金本位制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即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在金本位制度下,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手段是国际贸易,在市场有限或者被人为割裂、封锁的条件下,各国之间贸易竞争的结果往往是“零和”的,彼方的损失即是己方的收益,这也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流动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现今的美元体系下,各国间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正和”的,彼此的成本与收益高度关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要共同承担危机的成本与损失。这种变化对美元体系的持续在相当长时期内可能更加有利。

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明,危机期间以及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自60年代起,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每当危机(主要是80年代后的危机)爆发后,不论原因为何,亦不论危机爆发于何处,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或投资者确保资产安全与风险规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种状况即便在欧元诞生后仍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经济所遭受的重创甚至超过美国本身,说明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依旧是以美元为主导,欧元尚不具备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能力。

第三,未来美国经常账户的“流量调整”能力虽然有限,但若考虑到“存量调整”(估值效应)的作用,其汇率调整以及国际投资头寸的特殊结构都将对经常账户恶化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控性。^①

自1970年代初以来的四十多年里,美元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长期处于

^① 有关“存量调整”(估值效应)问题的相关研究,请参见李晓、周学智:《美国对外负债的可持续性:外部调整理论的扩展》,《世界经济》2012年第12期。